

多角度解读中小企业钱荒

黄小鹏

国企央企、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一直面临着不同的金融待遇,中国金融市场的二元现象其实由来已久。只不过近期媒体对中小企业钱荒及民间借贷市场的疯狂高利率的连篇累牍报道,提醒了人们这种旱涝不均的严重性。不过,目前对这种现象的大多数解读仍停留在市场属性层面,所开出的药方也以经典的扶持政策为主。实际上,中国信贷市场二元化问题,除一般性的市场原因,更多地反映出中国经济在体制、模式和政策方面的深层次问题,需要进行多维度的解读。同时,如果没有体制方面的改革和模式方面的调整,单纯的支持政策可能收效甚微。

首先,必须承认信贷上的二元化是市场经济的一般现象,反映了市场的内在规律。任何一个经济体都存在中小型企业和大型企业并存现象,在规模经济规律的驱使下,银行更倾向于面向大企业的批发业务,而不喜欢面向中小企业的零售业务,因为中小企业贷款的信息成本和监督成本都大幅高于大型企业。从理论上讲,通过取消利率管制,让银行自主定价,那么风险补偿的提高可以给银行提供激励,解决中小企业无法获得信贷的问题,但如果不同时给予政策扶持的话,这个补偿之大可能会把利率推高到中小企业无力可图的地步,结果变得没有意义。因此,即便是金融自由化程度相当高的国家,仍然需要依靠某种程度的支持性政策,以鼓励银行提供中小企业能够承受得起的信贷。

其次,信贷上的二元化对应着体制内外的差别,反映出中国企业面临着的不公平竞争环境。大企业、中小企业,

国企、民营;体制内企业、体制外企业,这些分类既有重叠也有差别,企业规模是市场层面的问题,但体制内外的分野则是制度方面的问题。体制内的企业享受着超国民待遇,不仅在土地、资源、许可证、业务订单上,甚至在税收、监管、司法等方面都享受着超国民待遇,在信贷等金融方面也享受着间接配给、隐性担保等支持,他们不但更易获得贷款,而且在资金成本方面也占有优势。相反,体制外企业面临的是低国民待遇,不但无人支持,反而有可能会受到打压。

正是由于存在体制内外的区别,做大不是中小企业的唯一目标,成为体制内企业同样具有诱惑力,为此他们可能会花费相当的精力来进行寻租。事实上,在不少地区,民营企业同样成功晋身为体制内企业,从而大大降低了融资成本。据报道,在这波中小民企遇到最为严峻的资金断流情况下,浙江、福建仍然有一些成功晋身为体制内的民企和国企一样资金来源充足,他们甚至将从银行获得的低成本资金投入到民间借贷市场,向那些中小企业放贷,坐享利差。

第三,信贷旱涝不均现象与货币政策工具选择有一定关系。除了利率市场化不充分这个老大难问题影响到中小企业融资外,货币政策是采用准备金率工具还是利率工具,也会影响到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

提高准备金率这一数量工具,压缩了银行的可贷资金,在利率被管制的情况下,银行很难大规模地提高对中小企业的利率,既然利差不足以覆盖风险,那么有限的资金更是愿意流向国企、央企等体制内企业。相反,如果通过加息这种方式来提高所有企业的资金成本,

就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体制内企业的资金需求,加息后法定利率与中小企业所面临的影子利率的差距也会缩小,这两方面共同作用,有利于减缓目前这种信贷配给问题。今年上半年,一直以提高准备金率来进行紧缩,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国企央企与中小企业之间的旱涝不均现象。

第四,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问题。当前中小企业严重的钱荒问题,与前几年他们荒废主业,过度介入虚拟经济也脱不了关系。大量资金,甚至相当部分自我积累资金都投入楼市股市赚取快钱,一旦开始紧缩,很快就会出现资金周转困难,乃至冲击主业。而这些中小企业此前之所以大量介入楼市股市,又与中国整体经济泡沫化、实体经济特别是体制外实体经济经营困难有莫大关系。这波中小企业钱荒最严重的地区浙江温州及福建等地,向来也是资金投机风很重的地区。

第五,金融市场举国体制与市场化运作的内在矛盾。经过一轮声势浩大的改制,中国的大型银行从表面上看比原来更像是自负盈亏的企业,但金融危机爆发后的放贷大跃进则提醒我们,银行仍未真正独立,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在执行政府意志,而政府也仍然在大量发挥其隐性担保角色作用。

对独立性不够的银行来说,将资金投向具有隐性担保的体制内企业显然是理性的。所以,我们看到央企、国企和地方政府平台,获得了大量的信贷,而体制外的民企,特别是中小民企,只能

眼睁睁地看着外面的大河河水猛涨,自家河却依然处于涓涓细流甚至不时断流的状态。

上述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体现的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这一矛盾主要应该通过完善金融体系和政策,比如发展针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机构,发展担保中介机构,在监管中降低对中小企业贷款的资本要求等支持性政策来解决。

其余四个方面,都或多或少地与我国特有的经济体制、发展模式相关,其反映的矛盾是体制性的,需要对发展模式作根本性的调整。比如说,体制内外企业的超国民待遇与低国民待遇并存问题,就与市场经济的平等竞争本质相违背,需要从根本上加以反思和纠正。比如说,利率市场化进展缓慢及政策工具冲突问题,需要加快改革的步伐。再比如,泡沫化问题,扭曲企业价值观,严重危害经济长远健康发展,损害民族道德根基,要解决泡沫化问题,需要政治上的长远眼光,需要抵制以泡沫化推动增长这种模式的诱惑。再比如举国体制,我们不能被其短期好处所蒙蔽,忽视其长远的危害。

总之,当前的中小企业钱荒以及信贷市场二元化问题,要超越市场属性本身去理解,才能找到其复杂的根源。而对这些市场之外问题的正本清源,不仅有助于解决信贷市场二元化问题,也有利于解决中国经济其它诸多矛盾和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和钱荒问题一样,也是植根于这种大量复杂而扭曲的经济体制环境。

求解信贷市场“旱涝不均”



猪肉价格淡季创新高

猪肉价格创新高,百姓心头直发毛。供求变化难把握,市场调节不蹊跷。股票投资盯农牧,居民买菜省肉膘。食衣住行非小事,通胀管理要搞好。

徐建军/画
孙勇/诗

降低路桥费的担忧与期待

廖水南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改委等5部门日前下文通知,6月20日至明年5月31日,将开展收费公路违规及不合理收费专项清理,已还清建设贷款的政府还贷公路要立即停止收费;收费期满的公路收费项目,要坚决撤销。其间禁止新增经营性普通公路。

前不久,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比例从1991年的24%下降到目前的17.8%用了19年时间,即19年中国的物流总费用占GDP的比率仅下降了6.2个百分点。对比发达国家,其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在10%左右,仅为中国的物流成本的二分之一,而民间对于降低路桥费的呼声更是此起彼伏。

有太多生灵活现的实例佐证路桥暴利这个事实,这些无可辩驳的实例也告诉我们,高额的物流成本正在不断侵蚀底层民众的切身利益。而“天价过路费”、“菜贱伤农”只不过是对当下民生窘迫艰辛的一个写照与映射。好在中央部委已经将目光聚焦于高企的物流成本,决心用实际行动来缓解低收入群体无法回

避与掩饰的民生之痛。

但笔者认为,虽然开展专项清理,能不能取得理想中的效果,前景不容乐观。

按照国家规定,公路每40公里设置一个收费站,而根据调查全国违规超设收费站现象相当普遍。例如,据广东省政协委员黄晨光的调研报告,从河源市到广州市的198公里路程中,就有7个收费站,尤其是进入广州市中心25公里的路程就有5个收费站,“每5公里1个收费站,可说是世界之最”。法律遭遇尴尬,清查效用几何?

此外,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各种违规收费本身就是许多地方政府和利益集团的“摇钱树”,要想他们放手,谈何容易?

事实上,开展收费公路违规及不合理收费专项清理,取消或降低路桥费,本身就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措施,对降低社会交通成本、提高流通、增加利润,以及加快经济活动速度、促进经济增长,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尤其在当前CPI增幅连连破5的通胀压力下,抑通胀、降物价莫如从减免沉重的路桥收费开始。因此,笔者希望,相关方面能通过多方努力和周密部署,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应有效果。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1)》指出: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为保证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报告》的发布以及其他各部委政策频频出台,明确向我们传达了宏观政策的转向,即由前期注重货币政策操作,收紧货币,回收流动性,转向更多运用财政政策以及其他政策对经济给予支持,综合运用多种政策调控手段,共同遏制通货膨胀,促进经济稳步增长。

目前运用货币政策调控经济其作用是有限的。

首先,持续运用收紧的货币政策会带来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自2010年下半年以来,央行已4次加息、7次提高准备金率,市场上的资金已经相对不很充裕,而且,在外围市场还在为经济复

苏助燃而处于宽松货币环境中时,中国频繁加息将促使国际热钱流入中国,加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其次,持续运用收紧的货币政策会

遏制经济增速,在遏制通货膨胀的同时,将提高企业的融资成本,从而将遏制经济的发展速度;在世界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这种政策选择将会给中国经济带来许多问题。

中国的财政政策还有较大的发挥空间。

2010年我国全年财政收入83080亿元,比上年增加14562亿元,增长21.3%。今年前5个月全国财政收入46820.06亿元,增长32%,已实现全年预算一半以上的财政收入,增速大大超过8%的计划,预计2011年全年财政收入实际增长将高于预算安排而出现超收的局面。财政收入的大量增加,为宏观经济增加了可供利用的广阔空间,尽管今后几个月,随着经济增速的

放缓,财政收入的增加速度可能会减慢,但总体来看,中国的财政政策还有较大发挥余地,一旦经济状况变坏,经济下行风险加大,国家可以更好地调动财力,通过加大财政投入的选择而刺激经济增长,从而缓解经济出现紧缩的局面。

财政政策最明显的工具和作用机制

是通过减税和转移支付等方式,以减轻

企业的负担并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等,

这样一方面是可以提高企业活力,增强企

业的成长性;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加中低

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可以有

效地刺激内需,对经济增长起到较好的

推动作用。

多种政策组合,共同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产业政策等

多种政策的组合运用,有利于趋利避

害发挥各种调控政策的优势,在货币政

策操作影响过大,经济增长不稳,其他

■口舌之勇 Sun Yong's Column

钱荒、民工荒与友情伤痕



孙勇

有20年交情的两个老朋友,因为彼此间发生了债务逾期未还的借贷问题,差点闹得友情彻底破裂。这是最近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件真人真事。

故事中的主人公,一位被我称为张哥,一位被我称为陈哥,他们都是我的高中同学兼老乡。目前,陈哥是深圳一家小规模加工企业的老板,张哥则是一家驻深外资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

2008年之前,陈哥的事业可谓顺风顺水。金融危机爆发后,陈哥工厂的生意急转直下,订单急剧减少,大批工人辞职。2009年下半年,随着全球经济回暖,来自海外的订单增多,陈哥的生意又有了起色。

2010年4月,陈哥幸运地接到一个大订单,如果顺利搞掂,就可净赚几十万元。孰料陈哥举全厂之力通过加班加点完成产品交付后,却和收货方发生商务摩擦继而打起了官司。由于巨额应收账款迟迟不能到位,陈哥的资金链告急,麾下所剩不多的工人越发流失。彼时,陈哥从银行借贷无门,对民间的高利贷又吃不消,只好求助于各方亲戚朋友。张哥很干脆地借给陈哥10万元。

按照陈哥对张哥的口头承诺,这笔钱快则10天,慢则1个月就会归还。没想到,还钱的日期一拖再拖,直到1年后的今天也没有兑现。期间,张哥要买房子,便数次暗示陈哥尽快还钱。陈哥以各种理由一再拖延,最后索性连张哥的电话也不接。两人的关系由此降至冰点。据了解,陈哥至今还未打完官司,名下资金数百万元被冻结。一年来,陈哥的工厂人心惶惶,每天都有工人辞职;债主纷纷上门讨钱,陈哥疲于应付,索性换了手机号码,当起了躲债的“游击队长”。

陈哥的故事,是当下中国中小企业在“钱荒”和“民工荒”的冲击下艰难图存一个缩影。这些中小企业处于产业链的低端,技术含量低,进入门槛不高,凭借廉价劳动力和产品的低价优势,从“人口红利”中分享一杯羹。经济大环境向好的时候,这类中小企业尚能办得风生水起,以陈哥为例,在需求火爆、生意鼎盛的2007年,他的个人资产超过1000万元,麾下员工有300多人。然而,一旦宏观经济不景气或出现意外事件,这类中小企业便生存堪忧,甚至随时有可能关张,陈哥目前的窘境,就是一个明证。

从上世纪90年代到2007年,是中国民营中小企业高速发展的黄金年代。我的几个当小企业老板的同学或朋友,都是在此期间发迹。这些同学或朋友首先是到沿海城市打工,学技术,学管理,积累营销经验,凭借打拼或机遇掘得人生“第一桶金”,然后自办工厂当老板。而他们开始当老板的年份,都是在2000年前后,那时,他们虽然手头有一些积蓄,但用来办厂还不够,于是,他们就向亲友、同学、熟人借钱,最终把工厂办了起来。那时招工也很容易,开出1000元左右的月薪,就能从老家呼啦啦招来一大帮工人。这种以乡情与“熟人经济”为依托的融资与

招工方式,成就了我多位同学、朋友的“老板梦”和“发财梦”。

然而,随着中小企业规模的壮大、老百姓理财意识的觉醒以及“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小老板们这种借力乡情和“熟人经济”发展的老路子逐渐行不通。首先,在达到一定规模后,中小企业融资的额度往往较大,动辄以几十万、几百万元计,这和当年小老板们白手起家办工厂只需借几万元、十几万元不可同日而语,而这也10多年来,老百姓(尤其是农村地区的)收入增长缓慢,手中余钱不多。其次,物价高涨和财经知识普及,使得老百姓(尤其是城市中的)理财意识觉醒,他们更愿意将手中的闲钱用于投资房产、股票、黄金等有较大升值潜力的资产,或者放高利贷,而不愿意借给熟人,因为借给熟人带来的物质回报相对较少(熟人在还钱时,通常是设一个饭局或送一些礼物作为感谢)。第三,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青壮年劳动力因短缺而变得抢手,以“人情价”(这是一种暗含折扣、弹性较小、更有利与资方的用工价格)为纽带的老乡帮衬式用工关系自然难以继。

2009年以后,我的同学或朋友中的小老板们,都几乎陷入了事业的低谷。这两年,我们在深圳的同学们开得少了,同学中的小老板们抢着买单的情形也没有以前那样热烈。最近一段时间,同学中的几位加工企业老板经常向我抱怨:厂里缺工严重,加薪也招聘不到工人,好不容易搞一个订单,却没有足够的工人去干活。我回答:这说明你们给工人加薪的力度还不够。他们苦笑:现在加工行业竞争厉害,产品互相杀价,利润微薄,而厂房租金、水电、原材料都在涨价,工人薪资涨幅如果超过35%,厂子就无法撑下去了。他们也有给产品升级的念头,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钱从何来?银行不给贷款,他们只好硬着头皮向民间高利贷,或者厚着脸皮向亲友和同学求援。如果说,10年前他们向同学借钱办厂的结局是皆大欢喜,那么,最近两年他们向同学借钱的结果,都是闹得不愉快。陈哥和张哥之间的故事,就是其中一个略显极端的案例。

本周,央行又一次提高准备金率,信贷紧缩的局面进一步加剧,珠三角地区中小企业“缺钱”的呼声也随之高涨。与此同时,银监会出台的鼓励银行信贷扶持中小企业的新文件,正在被各方热议,不知何时才能真正落实为关爱中小企业的实际行动。

当此之际,我深切地同情那些为中国GDP、税收和就业做出巨大贡献的中小企业,也更加惦念我的那些在“钱荒”和“民工荒”中夹缝求生的当小老板的同学们。希望从今年开始,中小企业的融资难能够切实得到缓解;更希望那些充满活力和创新精神的中小企业主们,能够拿出告别家族经营模式和产业链低端位置的决心和勇气,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实现产品升级和产业转型,将自身进化成银行和打工族追捧的非苦力型企业或朝阳企业。

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和张哥通了一次电话,他告诉我:近日,陈哥携夫人主动到他家登门“谢罪”,解释了自己躲债的苦衷,得到了他的谅解;双方的心结已经解开,友情的伤痕有望弥合。这是一个好消息。我想,以此事为警示,我的那些当小老板的同学们,应该会逐步摒弃以乡情和“熟人经济”为依托的企业经营模式了,这种转变,小而言之,是为呵护友情建立了防护墙,大而言之,是传统经营理念的现代化转型。当然,要做到这一点,离不开国家信贷政策的科学引导,离不开商业银行的积极作为。保护友情不受伤害有很多方式,取代“熟人经济”的银行信贷也是其中的一种,这个判断你信吗?我信!

联系我们

本篇文章如无特别申明,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也不代表作者供职机构的观点。如果您想发表评论,请打电话给0755-83501640;发电邮至pp118@126.com。